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协同推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蔺伟虎[1,2]

(1.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农业农村发展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1;2.兰州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甘肃 兰州 730010)

摘 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深入探讨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通过分析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下伦理失范与生产力发展瓶颈,提出"伦理—技术—制度—文化"四维协同演化模型的假设,阐明了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在乡村振兴中应相互促进的观点。通过优化伦理价值导向、强化技术创新驱动、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可实现农业伦理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提升,从而为乡村振兴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农业伦理重构;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coordinated rural revitalization via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ethics and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n Weihu[1,2]

(1. Institute of Rur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anzhou Gansu 730071, China; 2.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Lanzhou Gansu 73001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co-evol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ethic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analyzing ethical anomie and productivity bottlenecks under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modes, a four-dimensional co-evolution model covering ethics, technology,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is proposed. The study holds that agricultural ethical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mutual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ordinated progress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optimizing ethical guidance,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inheriting & innovating local culture, which offer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levant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ethic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ural revitalization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推进过程中,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成为亟待突破的关键课题。当前,我国正处于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下长期积累的生态破坏、资源浪费、代际不公等伦理失范问题日益凸显,同时,农业生产力发展也面临技术瓶颈明显、创新不足等困境。

农业伦理重构,旨在重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的新型价值体系,新质生产力培育,则强调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二者的协同发展,对于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看,二者的互动研究有助于丰富农业伦理学与生产力发展理论;从实践层面讲,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路径与方法。

农业伦理学致力于系统反思与农业及食品

收稿日期:2025-08-18

作者简介:蔺伟虎(1994—),男,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农村、草业生态研究,E-mail:2558816201@qq.com。

研究、生产密切相关的道德信念、价值观、道德规范及底线伦理，旨在构建一套条理分明的统一伦理学框架，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决策者审慎考虑农业创新战略和决策[1]。

在国外，农业伦理与生产力发展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例如，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理论为农业伦理研究奠定了基础[2]；舒尔茨对农业生产力的研究则推动了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3]。近年来，有关农业伦理与生产力发展的关联性，探讨如何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实现伦理价值的研究愈发受到广泛关注[4]。

相较而言，国内农业伦理学研究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1992 年，胡一胜[5]从农业道德角度分析了农业伦理学的特征；2014 年，齐文涛等[6]对农业伦理学的概念进行定义，提出伦理维度是农业内涵的有机组成，发展农业伦理学是对农业本有之义的回归和应然状态的探索，并强调系统推进农业伦理学建设的重要性。之后，我国草业科学家任继周院士携团队建立了完整的农业伦理学学科体系[7-9]，并在兰州大学等高校开设相关课程，为我国农业伦理学开启了新征程。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2024 年 1 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和基本要义：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基于此，国内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视域开展一系列的研究，挖掘新质生产力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的新方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要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繁荣协调共进的新发展模式，亟需妥善处理农业伦理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近二十多年来，农业伦理学的理论价值逐渐显现，其内涵阐释与体系构建等方面均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然而，针对二者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协同演化关系尚未开展。因此，本文尝试对两者协同演化路径进行初步探索，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思路。

1 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论基础

1.1 农业伦理重构的内涵与价值

农业伦理重构是对传统农业伦理观念的反思与革新。它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其内涵包涵三重维度：一是生态伦理维度。通过重构农业生产中人类与自然的道德契约，建立以生态承载力为基础的资源利用边界，将“顺天时，因地宜”的传统智慧升华为生态整体性保护机制。二是社会伦理维度。构建包含土地权益分配、产业链收益共享及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新型伦理框架，以制度创新保障小农户的发展权与新型经营主体的社会责任实现有效对等。三是技术伦理维度。建立面向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现代农业技术的伦理审查标准，形成技术创新与生态安全、文化传承之间的协同约束机制。

农业伦理重构为农业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农业生产向可持续、高质量方向发展。其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其一，通过农林牧耦合生产的共生互补机制，实现生态增益效益。其二，基于“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伦理范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与社会协同能力。其三，传承“爱物惜生”“耕读传家”等传统伦理精神，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认同基础。

1.2 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要素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与能级跃升。其核心要素体系呈现 3 个维度：一是科技创新发挥战略引领作用。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与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提质增效的核心动能。二是产业融合推动体系重构。重点促进农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深度协同，依托智慧农业、精准管控等技术手段重构产业链生态，拓展高附加值发展空间。三是人才

培养强化智力支撑功能。聚焦产教融合机制创新，着力培育兼具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经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生产力迭代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撑。

1.3 协同演化理论视角

协同演化理论认为，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通过协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10]。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构成一个复杂系统，两者相互依存、协同演化。一方面，农业伦理重构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价值约束与方向指引。通过确立生态保护、代际公平、社会正义等伦理准则，农业伦理体系为智能农机应用、基因编辑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划定伦理边界，确保技术创新始终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农业伦理重构提供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撑。数字农业、精准种植等新质生产力形态，通过改变传统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推动形成“科技向善”“生态优先”等新型农业伦理共识。二者的协同演化，有助于实现乡村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

2 农业伦理失范与生产力发展瓶颈分析

2.1 农业伦理失范表现

1)生态伦理缺失。在传统农业“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发展模式下，化肥与农药的过度使用成为常态，不仅直接破坏土壤结构、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更严重扰乱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引发一系列连锁环境问题。例如，耕地退化已呈现区域化加重趋势，2001—2021年，黄河三角洲耕地退化率达到了12.71%[11]，部分地块出现土壤板结、保水保肥能力下降等状况，致使原本适宜种植的棉花、小麦产量年均减产5%～8%。同时，农业灌溉对地下水的过度依赖，导致超采问题突出，华北平原某粮食主产县的地下水位较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15～20 m，部分机井干涸，当地不得不投入巨资实施跨区域调水工程[12]。此外，农业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同样触目惊心，过度放牧、滥砍滥伐等行为直接加剧水土流失与生物多样性锐减，严重违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原则。以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部分区域为例，长期超载放牧使草场载畜量远超生态承载极限——有研究表明，过度放牧可能导致植被结构不稳定，进而诱发草地退化等问题[13]。当前，该区域退化草场占比已达38%，曾经常见的黄羊、旱獭等物种数量锐减，优质牧草比例从80%降至不足40%，取而代之的是狼毒、碱蓬等有害杂草，草原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濒临崩溃。

2)社会伦理失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引发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峻，其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的空心化表现，构成乡村振兴的核心瓶颈。例如，江西石城县多个偏远行政村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不足30%，留守者多为老人与儿童，村级组织运转乏力，大片耕地因无人耕种而撂荒，农机农技服务难以落地，产业发展陷入“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的双重困境；福建连城部分村落户籍人口200余人，常住人口仅40余人且多为老人，农田荒芜、生态优势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进一步加剧了空心化的恶性循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部分企业与农户利益分配不均，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受到挑战。以山东寿光部分蔬菜产区为例，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锁定收购价——市场上涨时企业占据绝大部分利润，价格下跌时则通过质量扣罚等方式压低收购价，农户承担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却仅获少量收益，利益分配比例悬殊，相关纠纷频发。此外，乡村传统文化传承面临严峻挑战，一些传统习俗与手工艺逐渐消失，乡村文化认同感降低。如江南某竹编之乡，竹编技艺传承人多为高龄老人，青年传承人不足10人，传统纹样与技法濒临失传；湘西部分土家族村寨的摆手舞、三棒鼓等民俗活动，仅在少数行政村得以保留，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日渐模糊。乡村文化的精神凝聚功能被不断削弱，居民文化认同感呈持续下滑态势。

2.2 农业生产力发展瓶颈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面临多维结构性瓶颈，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技术创新不足。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依然较弱，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水平不高，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存在障碍。目前，农业生产仍以传统技术为主，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较低，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2)产业融合程度低。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尚缺乏足够的深度与广度，产业链条较

短，产品附加值偏低。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有待提升，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发展尚不充分，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3）人才短缺。农村地区人才流失严重，缺乏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业人才。现有农业从业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接受新技术、新理念的能力有限，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现实要求，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3 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协同演化路径

3.1 构建“伦理—技术—制度—文化”四维协同演化模型

基于协同演化理论，本文构建“伦理—技术—制度—文化”四维协同演化模型，以农业伦理重构为价值引领，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核心目标，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完善与文化传承创新，实现四维要素的协同发展。

农业伦理是价值锚定的“指南针”。作为整个协同体系的价值中枢，农业伦理发挥着根本性的价值准则锚定作用：为技术创新把控发展方向，为制度设计明确价值导向，为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伦理标尺，从根本上确保农业发展方向的正当性与可持续性。

技术创新是驱动发展的“发动机”。技术创新构成系统的核心动力引擎，既为伦理实践提供物质载体与实现路径，又为制度实施搭建高效运作的技术平台；同时，借助数字技术等新兴手段赋能文化发展，创造农业文化的新表达与传播形态，持续激活协同发展的内生发展动力。

制度完善是规范运行的“压舱石”。制度完善作为刚性保障机制，通过科学规则制定与严格规范执行，推动伦理规范有效落地，确保技术创新在合理合规的框架内有序运行，为各要素协同提供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

文化传承创新是凝聚共识的“粘合剂”。文化传承创新凭借精神凝聚与价值传递功能，增强社会对农业伦理的深层认同与践行意愿，激发公众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营造“尊崇伦理，崇尚创新，遵守规范”的良好社会氛围，持续强化协同发展的精神纽带与文化向心力。

在农业伦理的价值引领下，技术创新、制度完善、文化传承创新协同发力、协同演化，共同驱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与乡村社会全面进步，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注入系统性的变革力量。

3.2 优化伦理价值导向，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树立正确的农业伦理价值观，应将生态保护、社会公平、文化传承等核心价值理念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全链条，以此作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根本准则。在农业技术革新与产业模式选择中，须以伦理标尺为价值导向，优先推动符合可持续发展方向与人文关怀的创新实践。具体而言，应大力推广以生态循环为核心的农业技术体系，包括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模式、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等，从源头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促进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同时，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将农耕文明、民俗传统、地域特色等文化元素融入农产品开发与乡村旅游服务中，打造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农业品牌，既促进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实现农业伦理价值与生产力发展的有机统一。

3.3 推动技术创新，赋能农业伦理实践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投入，引导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构建协同攻关机制，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壁垒。发展智慧农业，打造“感知—决策—执行”全链条智能生产体系。生产端依托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农田数据，实现“硬件智能＋生产数字化”的提质增效；决策端借助大数据与AI算法提供精准种植方案，如玉米种植中AI可自动判断苗情并调整水肥配比；执行端通过无人植保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实现自动化作业，显著降低生产成本与资源浪费。

发展生物农业，以生物科技重塑传统生产逻辑。以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为支撑，推动农业从“资源依赖”向“技术依赖”转型。在育种领域，利用CRISPR技术培育抗逆高产作物，有效破解极端环境下的种植难题；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以生物农药和生物防治逐步替代化学农药，践行绿色生态伦理；在废弃物处理环节，通过微生物技术将农林牧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或沼气，构建循环型农业模式。

推行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全产业链升级。借助数字技术打破产销信息壁垒，实现“产供销”全链条数字化贯通。流通端建设农产

品溯源系统，以二维码关联全流程信息，既保障产品安全，又契合诚信伦理要求；销售端依托电商、直播等新渠道搭建产销直连通道，减少中间环节，提升农民收益；治理端建设数字化综合平台，整合土地、产业、人口等多维数据，为乡村规划与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提升治理精准度。

在上述技术路径的协同推进下，应着力推进新技术成果的落地转化与有效应用，以技术创新实践为农业伦理理念的实体化提供坚实支撑。

3.4　完善制度保障，促进协同发展

建立健全农业伦理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明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伦理责任与义务。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政策支持力度。具体而言，可通过制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与农户积极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同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机制，引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农民共同融入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进程，形成协同发展合力。

3.5　促进文化传承创新，增强协同发展内生动力

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道德规范等精神资源，为农业伦理重构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系统构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建立数字化文化档案库，运用影像采集、三维建模等现代技术手段，对古建筑、传统技艺、民俗活动等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记录与动态保护，实现文化资源的永续留存与活态传承。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文化创新，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机融合，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开发乡村文化旅游、传统手工艺体验等特色项目，提升乡村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使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通过文化传承创新的持续推进，不断增强农民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激发其参与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四维协同发展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持久的内生动力。

4　结论

本文认为，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之间存在紧密的协同演化关系。据此提出构建“伦理—技术—制度—文化”四维协同演化模型，通过优化伦理价值导向、推动技术创新、完善制度保障与促进文化传承创新的系统路径，能够有效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目标，为破解乡村发展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系统性理论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尚属初步探索，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深入拓展：一是进一步深化农业伦理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协同演化的理论研究，构建更完善的理论模型。二是加强实证研究，结合典型案例与区域实践，检验并丰富现有理论框架。三是密切关注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发展对农业伦理与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具前瞻性的理论指导与方案。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农业伦理学及其研究方法 [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5(6)：19-26.

[2] 郭超.生态的伦理向度：从人走向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21.

[3] 王一帆，吴佩林.我国传统农业改造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读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思考 [J].农业经济，2015(1)：45-47.

[4] Thompson P B.Agricultural ethics：then and now [J].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2015，32(1)：77-85.

[5] 胡一胜.试论农业伦理学的特征、对象及体系 [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1992，14(5)：28-31.

[6] 齐文涛，任继周.农业伦理学：一个有待作为的学术领域 [J].伦理学研究，2014(5)：109-115.

[7] 任继周.中国农业现代化基准线的农业伦理学界定 [J].草业学报，2020，29(12)：1-4.

[8] 任继周，胥刚，林慧龙，等.中国农业伦理学的多维结构 [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3)：1-7.

[9] 任继周，姜萍，郭辉，等.中国农业伦理学的初心与使命：任继周院士访谈 [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2(4)：1-9.

[10] 陈新雅.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 [D].太原：山西大学，2018.

[11] 王林林.黄河三角洲耕地退化时空变化特征提取及预测方法研究 [D].南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24.

[12] 仲志余，张建云，王焰新，等.华北地区深层地下水回补修复试点研究与思考 [J].中国水利，2025(15)：1-5.

[13] 陈思思.放牧强度对草甸草原土壤碳氮组分及酶活性的影响 [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24.